

面向东盟的战略跃迁：广西承接粤港澳大湾区新质生产力外溢路径研究

黄茗权¹，李小燕²，吴延²，武媚³

- (1. 广西职业师范学院经济与贸易学院，南宁 530007；
2. 广西壮族自治区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南宁 530022；
3. 广西艺术学院，南宁 530022)

摘要：在新质生产力重塑区域经济格局的背景下，以广西为对象，探讨其在承接粤港澳大湾区新质生产力外溢过程中实现由“通道经济”向“枢纽经济”转型的内在机理与路径。研究构建涵盖外溢效应与产业梯度的理论框架，结合PEST、SWOT模型及外部因素评价（Internal Factor Evaluation, IFE）和内部因素评价（External Factor Evaluation, EFE）矩阵，对广西内外部环境进行系统分析。结果表明，广西呈现地缘优势与内生短板并存、国家战略机遇与区域竞争压力交织的特征。应突破被动承接模式，构建“存量变革、增量崛起、未来布局”协同推进的新质生产力发展战略，通过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精准承接与未来产业前瞻布局实现结构优化。制度改革深化与营商环境优化是战略实施的基础保障。为边缘地区依托外溢效应培育内生动力、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系统化路径。

关键词：东盟；粤港澳大湾区；新质生产力；外溢效应；产业梯度转移；枢纽经济

中图分类号：F127；G301 **文献标识码：**A **DOI：**10.3772/j.issn.1009-8623.2025.11-12.008

在高质量发展成为核心目标的时代背景下，“新质生产力”这一关键概念的提出，标志着对传统增长路径的超越。粤港澳大湾区（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GBA）作为中国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引擎，其创新与产业动能正持续外溢。学术界已从理论上将新质生产力定义为由技术突破、要素创新配置与产业升级共同催生的先进质态，其生成依赖于“技术-要素-产业”^[1]、“人才-科技-产业”^[2]及“科技-产业-金融”^[3]等多元融合互动。在区域层面，研究普遍揭示了“核心-边缘”结构中，核心区对边缘区同时存在“扩散效应”^[4-5]与“回波效应”^[6]的二元影响。然而，现有文献多侧重于宏观理论或一般规律，鲜有针对区域研究，特别

是广西在承接GBA外溢时，如何规避“虹吸效应”与“低端锁定”等风险，并为转型提供系统性战略的研究。本研究旨在填补此空白，并提出核心论点：为将GBA的外溢势能转化为内生动力，广西必须实现从“通道经济”向“枢纽经济”的根本性战略跃迁。此跃迁的关键在于构建一个“存量变革、增量崛起、未来布局”三位一体的新质生产力发展体系。这将为广西及其他同类区域提供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价值的战略框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1 理论框架与概念界定

1.1 新质生产力的生成机理与理论内涵

新质生产力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中

第一作者简介：黄茗权（1988—），男，硕士，高级工程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工商经济、区域经济。

通信作者简介：李小燕（1976—），女，硕士，正高级经济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创新与科技政策。电子邮箱：lxgkjqb7611@163.com

项目来源：广西哲学社会科学课题“广西承接粤港澳大湾区新质生产力外溢对策研究”（24WT11）；广西科技界智库重点课题“广西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创新研究”（桂科协〔2025〕J-002，桂科协〔2025〕K-059）。

收稿日期：2025-09-30

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翟云等^[7]认为, 新质生产力的生成逻辑根植于世界现代化进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方位, 其学理意涵表现为生产要素构成与组合方式的超越。王廷惠等^[1]构建了“技术-要素-产业”分析框架, 系统阐释了其催生机制, 即由技术革命性突破作为“驱动引擎”, 引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这一“加速装置”, 最终通过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这一“支撑载体”, 实现生产力质态的系统性跃升。这一框架深刻揭示了新质生产力并非单一维度的技术进步, 而是一个多重要素协同演化的复杂系统。在此系统中, “人才-科技-产业”三链协同被认为是关键的内在机制。李亚玲等^[2]指出, 人才是科技创新的核心主体, 科技是产业升级的核心驱动力, 产业则是人才集聚和科技应用的最终载体, 三者之间形成闭环反馈、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同时, “科技-产业-金融”的融合互动则为这一循环提供了必要的资源保障和催化剂。任宇新等^[3]的研究表明, 单一要素难以有效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 必须通过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金融发展的有效对接与融合互动, 才能形成强大的发展合力。

1.2 区域经济互动机理: 外溢、梯度与效应辨析

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新质生产力高度集聚的“核心区”, 其发展必然对周边“边缘区”产生深刻影响, 这种影响的传导机制复杂多元, 学术界已从不同维度进行了深入探讨。

核心机制是技术与知识的外溢 (Spillover)。技术外溢是新兴经济体国家补充技术知识、实现创新追赶的重要途径。张玉梅等^[8]指出, 这种外溢可分为两种主要类型: 一是“物化型技术溢出” (embodied technology spillover), 即知识通过有形商品和直接投资等载体进行流转; 二是“非物化型技术溢出” (disembodied technology spillover), 即知识通过专利、文献、人员交流等非实物形式进行扩散。Venturini^[9]进一步证实, 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为代表的智能技术知识能够产生显著的生产力溢出效应, 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重要特征。对于承接方而言, 有效吸收这两种溢出直接决定了其产业升级的质量和可持续性。

驱动外溢发生的根本动力是产业梯度转移理论。不同区域间的经济发展水平、要素成本和技术水平的差异形成了梯度势差, 驱动产业从高梯度地

区向低梯度地区进行转移, 以寻求新的比较优势。彭继增等^[10]在对赣州承接大湾区产业转移的研究中, 运用了该理论识别产业承接的重点。一个地区能否承接转移, 取决于其与转出地是否存在互补性地缘经济关系。傅东平^[6]在对广西北部湾的研究中明确指出了两种方向相反的经典效应: 扩散效应 (spread effect) 与回波效应 (backwash effect)。扩散效应指核心区发展到一定阶段后, 其技术、资本等向周边区域辐射, 带动周边发展的积极过程。而回波效应则指核心区凭借更高的要素回报率, 吸引周边区域的优质生产要素向其流动, 从而可能拉大区域发展差距的现象。罗琼等^[11]为这两种效应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并存提供了数据支持, 其发现大湾区高技术产业集聚同时存在显著的空间扩散效应与一定的空间回波效应。边缘区域的战略目标就是最大限度地利用扩散效应, 同时有效抑制回波效应的负面影响。

从功能视角看, 张玉梅等^[12]表明, 国际创新中心 (如粤港澳大湾区) 在功能上扮演着资源“集聚”与“辐射”的双重角色。它不仅能从全球范围“集聚”顶尖的创新资源, 还能通过知识溢出等方式将这些资源向“周边”地区“辐射”, 带动其技术进步。但这种辐射作用的实现严重依赖于周边地区自身的吸收能力 (absorptive capacity), 即识别、消化和应用外部知识的能力, 这是决定外部技术溢出能否转化为内生增长动力的关键中介变量。

1.3 核心分析框架: 从“通道”到“枢纽”的战略转型

基于上述理论, 本研究构建了一个核心分析框架 (见图1)。为在与粤港澳大湾区的互动中规避风险、把握机遇, 广西亟须推动从“通道经济”向“枢纽经济”的战略转型。“通道经济”模式本质上是上述负面效应的直接体现, 该模式下广西主要充当大湾区与东盟之间的物理通道, 被动承接产业梯度转移。这导致其面临高端要素受“回波效应”外溢影响、所承接产业多集中于低附加值环节与劳动密集型部门的显著风险。杨豫萍等^[13]指出, 广西在承接产业的过程中存在产业链条短、精深加工产品少等问题, 自身“吸收能力”无法得到有效提升, 因此, 最终被锁定在价值链低端。“枢纽经济”则是对积极效应的主

动塑造。在此模式下，广西不仅是物理通道，更是连接大湾区先进生产力与东盟广阔市场、创造增量价值的功能性节点。这一“枢纽”角色的核心，并非仅指广西面向越南的陆路地理优势，更是指其面向东盟十国的国家级“功能平台”优势。依托设立于南宁的中国—东盟博览会（China-ASEAN Expo, CAEXPO）与中国—东盟信息港，广西形成了超越单一陆地边境对接、面向整个东盟市场的综合服务能力。自2010年中国—东盟自贸区全面建成以来，广西与东盟经贸合作实现跨越式发展，成为中国与东盟互联互通的核心枢纽，双方的进出口额从2010年的429.0亿元升至2024年的3978.2亿元；借助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机遇，广西企业深

度参与东盟产业链分工，2025年1—9月，广西对东盟直接投资同比激增553.0%，制造业、批发零售和交通运输业成为合作重点^[4]。这均是其功能性枢纽角色的体现。广西利用区位优势，主动对接、整合、转化来自大湾区的“扩散”资源，其核心功能在于：为大湾区的新质生产力进入东盟市场提供“价值翻译”与“产业适配”，扮演大湾区创新资源向东盟市场“辐射”的“二级枢纽”角色。“价值翻译”和“产业适配”即将大湾区的高技术标准、商业模式和产品，针对东盟国家复杂的文化、法规和消费习惯进行“本地化”改造和适配。这要求广西必须系统性地提升自身的产业配套能力、科技“吸收能力”和持续优化制度环境，从而成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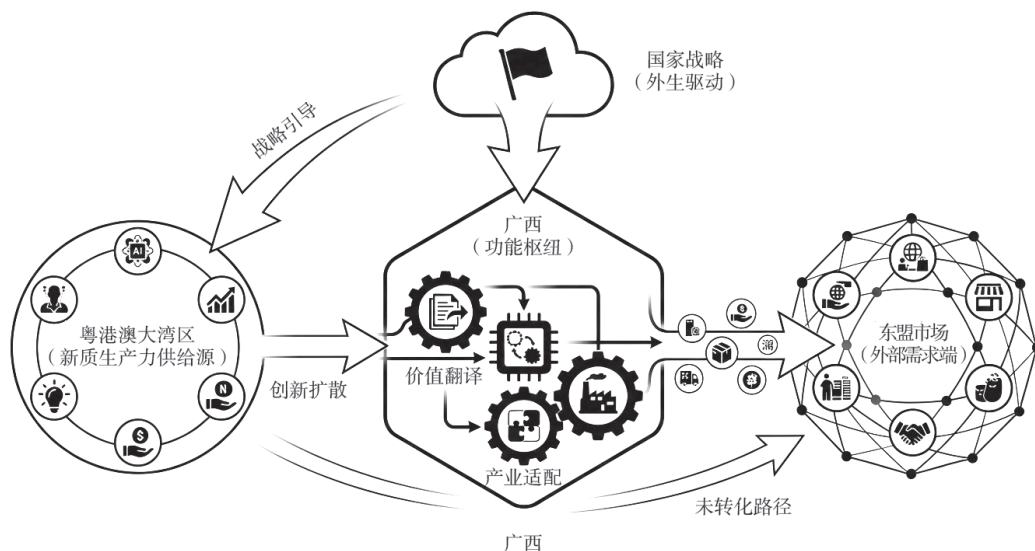


图1 理论分析框架

区域价值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1.4 研究方法与分析工具

为对上述战略转型进行深入分析，研究将综合运用以下分析工具：政治、经济、社会和技术（Political, Economic, Social, Technological, PEST）分析法，作为宏观环境分析的经典工具，用于系统性地分析广西在承接新质生产力外溢时所面临的4种外部力量；SWOT分析法与量化的外部因素评价（External Factor Evaluation, EFE）和内部因素评价（Internal Factor Evaluation, IFE）矩阵，作为战略分析工具，用于整合分析结论，并结合广西自身的内部优势与劣势，最终形成对广西战略态

势的综合性、量化性研判。

2 广西的战略环境深度剖析

2.1 非对称二元关系：GBA的外溢动力与广西的承接态势

在全球价值链重构背景下，GBA作为新质生产力高度集聚的“核心极”，与广西形成了典型的“核心—边缘”非对称互动格局，准确把握此互动关系，是科学制定广西承接与转化战略的核心前提。GBA之所以能成为新质生产力的强大外溢源，不仅根植于其庞大的经济体量与高度集聚的创新能力（中国拥有的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数量稳居全球第

一, “深圳-香港-广州”科技集群 2025 年跃居全球之首)^[15], 更在于其内部高效协同且动态演化的科研合作网络。郑佳等^[16]认为, 该网络以广州、香港、深圳为核心, 近年来日趋紧密, 同时正从“核心-边缘”结构向更加扁平化、多元化的网络形态演进, 为新质生产力的生成和对外辐射提供了强大动能。这种以创新为基底的结构决定了其产业必然持续升级和空间重构, 其外溢势能的产业逻辑则可归结为“双轮驱动”。一是电子信息、汽车等战略性支柱产业因成本优化与产业链延伸而产生的价值链外溢; 二是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为寻求特定应用场景或关键资源(如广西丰富的电池原料矿产)而进行的前沿探索布局。这两种逻辑共同构成了 GBA 多层次、动态化的外溢过程, 为承接地提供了切入价值链高端的潜在可能。深入分析可以发现, GBA 的新质生产力发展呈现“双轨战略”, 对欧美等发达国家, 处于跟跑或并跑状态, 面临高风险竞争; 而对东盟等发展经济体, 则实施“领跑”与“标准输出”的“蓝海战略”。中国与东盟签署的《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17]已将“数字经济”与“绿色经济”列为合作热点, 从国家战略层面出发, GBA 需将其已具备优势的新质生产力在东盟市场率先应用和推广, 以形成事实上的技术标准和产业生态圈, 这是其新质生产力外溢的根本战略动机。

2.2 外部宏观环境: PEST 分析

广西的战略抉择受政治、经济、社会与技术等多维宏观环境的综合制约。借助 PEST 分析框架, 可对这一复杂环境进行系统性解构与结构化研判。

2.2.1 政治环境

广西迎来了国家战略空前叠加的机遇期。中央赋予的“三大定位”新使命^[18], 与《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生效等多重国家战略在此交汇, 赋予了广西探索跨区域制度创新的“政策合法性”。尤其在全球产业链重构和《中国-东盟自贸区 3.0》议定书签署的背景下, 东盟市场已是中国“双循环”格局的战略交汇点。中央赋予广西的“三大定位”新使命, 不仅是区域政策, 更是承接国家意志、联通粤港澳大湾区与东盟两大市场的国家级战略任务。广西应发挥自贸试验区“试验

田”作用, 率先试点 3.0 版的新规则^[14]。广西的国家战略定位体现为从“前沿门户”向“创新高地”的转型。然而, 这一转型过程面临区域政策竞争同质化与激烈化的严峻挑战。目前, 粤港澳大湾区周边省份普遍出台了对接融入规划, 政策博弈日趋激烈。彭继增等^[10]对江西赣州系统性战略布局的研究表明, 仅依赖传统的减税降费政策, 广西将难以构筑真正的竞争壁垒。

2.2.2 经济环境

经济层面, 广西的机遇与挑战并存。机遇源于 GBA 产业梯度转移的客观必然性: 随着大湾区要素成本持续攀升, 其经济结构必然向知识密集型和服务业主导转型, 为广西承接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打开了宝贵的“机遇窗口”。但最严峻的威胁来自国内外竞争者的双重挤压。在国内, 湖南、江西等省份凭借其产业基础与成本优势形成直接的同质化竞争; 在国外, 以越南为代表的东盟国家则以更低的劳动力成本及 RCEP 贸易便利, 对劳动密集型和出口导向型产业构成了强有力的分流挑战。这种双重挤压极大地压缩了广西的战略空间, 迫使其必须寻找差异化的发展路径。这种挤压之所以严峻, 还在于 GBA 的新质生产力直面东盟市场时, 存在成本、标准“水土不服”和文化高度碎片化的适配等问题, 这为具备“翻译”能力的承接地留下了关键的战略空间。

2.2.3 社会环境

社会文化层面, 机遇在于广西与广东地缘相近、文化相通, 同属岭南文化圈, 为产业深度融合提供了降低隐性摩擦成本的社会基础。威胁则在于大湾区对人才的“虹吸效应”正持续强化及使区域人才格局更趋固化。数据显示, 广西 2024 年应届生外流率已攀升至近 40%^[19], 大部分流向珠三角, 这对广西的创新基础无异于“釜底抽薪”, 直接削弱了其承接高技术产业所必需的“吸收能力”, 易导致区域发展陷入“人才流失-产业低端化”的恶性循环。

2.2.4 技术环境

技术层面, 新质生产力范式为广西提供了“换道超车”的理论可能, 即通过直接引进、应用和消化吸收大湾区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前沿技术, 构建面向未来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然而, 巨大的技术“代差”与“吸收能力”瓶颈问题构成

了严峻挑战。2024年，广西的研发投入强度仅为0.87%，同期广东的研发投入强度为3.6%^[20]。广西在科研创新和人才储备方面薄弱，使其与粤港澳大湾区存在一定的技术差距。这种差距形成了“吸收能力”瓶颈。高技术产业发展存在“门槛效应”，只有当研发投入和产业结构达到一定标准后，正面效应才会显现。若无法有效提升自身吸收能力，广西很可能只能承接技术的“外壳”（如组装环节），而无法内化其“内核”（研发与创新），最终导致“有增长而无发展”的局面。

2.3 战略态势综合研判：SWOT 矩阵分析

综合以上对广西内外部环境的深度剖析，本节运用SWOT分析框架，系统性地梳理广西在承接大湾区新质生产力外溢时所面临的核心优势、劣势、

机遇与威胁，并在此基础上构建SWOT战略矩阵，以生成具有针对性的战略选项。

2.3.1 SWOT 因素识别矩阵

首先根据收集的资料和数据构建SWOT因素识别矩阵，详见表1。

2.3.2 SWOT 战略选项矩阵

基于上述因素识别，通过将内外部因素进行系统性配对，可以生成4种不同类型的战略组合，从而确保战略选择能够充分利用优势、克服劣势、抓住机遇并规避威胁，见表2。

2.3.3 综合研判

SWOT矩阵清晰地揭示了广西的战略处境：“独特优势与严重短板并存，巨大的机遇与严峻的挑战交织”。其核心机遇，正是在于粤港澳大湾区新质

表1 SWOT 因素识别矩阵

内部因素	优势 (Strengths)	劣势 (Weaknesses)
S1. 独特的战略区位：中国唯一与东盟国家陆海相邻的自治区，是连接大湾区与东盟两大市场的核心枢纽和“双循环”格局下的战略交汇点，具备不可替代的通道价值。	W1. 产业结构性失衡：传统产业占比近80%，附加值偏低，工业体系“大而不强”。新质生产力的内生培育能力不足，与大湾区高科技产业存在“代差”。	
S2. 丰富的生态与自然资源：拥有优质的水、海洋、矿产（锰、稀土等）、森林资源，生态环境质量全国领先，为发展绿色产业和承接高标准新质生产力提供独特优势。	W2. 创新生态系统性缺失：研发投入强度（0.87%）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人才“虹吸效应”显著（应届生近40%外流），高层次人才与平台匮乏，形成“创新洼地”。	
S3. 坚实的合作基础：已出台对接大湾区的顶层规划，在交通互联、产业协作、园区共建等方面积累了宝贵经验，与大湾区建立了初步的合作互信	W3. 基础设施与营商环境短板：支撑现代产业的“新基建”（如算力、工业互联网）滞后。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与大湾区标准相比仍有较大差距	
外部因素	机遇 (Opportunities)	威胁 (Threats)
O1. 国家战略交汇赋能：中央赋予的“三大定位”新使命与大湾区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战略在此交汇叠加，为争取重大政策、项目和改革试点提供了强有力支持。	T1. 多维度的区域白热化竞争：周边省份（湘、赣等）均将对接大湾区作为核心战略，政策优惠力度大，产业基础更优，导致广西面临激烈的竞争。	
O2. 大湾区产业升级的“窗口期”：大湾区产业结构调整 and 梯度转移为广西承接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提供了历史性机遇。	T2. 非对称整合的“边缘化”风险：在与大湾区的高度融合中，若自身造血能力不足，可能导致人才、资本等核心要素被加速“虹吸”，固化在区域分工的低端环节。	
O3. 全球产业链重构的契机：在全球产业链区域化趋势下，广西作为连接国内与东盟市场的“门户”，战略地位凸显。	T3. 承接过程中的“低端锁定”陷阱：在招商引资压力下，可能承接大湾区淘汰的落后或高污染产能，而非真正的新质生产力，导致产业转型陷入“路径依赖”。	
O4. RCEP与东盟市场的广阔前景：广西可成为大湾区企业进军东盟的“桥头堡”和生产制造基地，形成“大湾区研发+广西制造+东盟市场”的黄金走廊	T4. 复杂多变的外部宏观环境：全球经济下行、贸易保护主义等不稳定因素，可能对广西的外向型经济和跨境产业链安全构成冲击	

表 2 SWOT 战略选项矩阵

战略类型	战略选项
SO 战略 (增长型) (发挥优势, 利用机遇)	1. “枢纽放大”战略: 最大化利用 S1(区位)和 O1(国家战略), 将广西从物理通道升级为服务大湾区、链接东盟的战略功能平台(如跨境数据中心、RCEP 服务中心), 抢占发展制高点。 2. “GBA-广西-东盟”跨境产业链整合战略: 利用 S2(资源)承接 O2(GBA 产业转移), 围绕新能源电池材料等领域, 打造垂直整合产业链, 并利用 O4 开拓东盟市场
WO 战略 (扭转型) (利用机遇, 克服劣势)	1. “要素置换”战略: 利用 O2(GBA 投资)的资本和技术, 针对 W1、W2, 通过“市场换技术、场景换产业”模式, 在深圳等地设立“离岸创新中心”, 实现内生能力重塑。 2. “基金+项目”产业升级引导战略: 利用 O1 和 O2 的资金支持, 设立产业转型升级引导基金, 针对 W1, 以股权投资方式引导大湾区新技术、新管理模式注入广西传统企业
ST 战略 (防御型) (利用优势, 规避威胁)	1. “利益捆绑”战略: 利用 S1(区位)和 S3(合作基础), 应对 T1 和 T2, 通过共建共享收益的“飞地园区”, 与大湾区形成“一荣俱荣”的利益共同体, 构筑区域竞合壁垒。 2. “服务枢纽”差异化竞争战略: 利用 S1(面向东盟的门户), 应对 T1(与越南等地的成本竞争), 将竞争焦点从“制造工厂”转向“服务枢纽”, 构建基于服务能力的“护城河”
WT 战略 (聚焦型) (减少劣势, 规避威胁)	1. “非对称”战略: 为应对 T1(激烈竞争)和 T3(低端锁定陷阱), 并改善 W1、W2, 必须避免全面出击, 集中有限资源, 聚焦新能源电池材料、大健康等特定赛道, 形成局部领域的“单项冠军”。 2. “营商环境革命”对标战略: 为应对 T1 和改善 W3, 发起一场以“接轨大湾区”为目标的营商环境革命, 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构筑基础竞争力

生产力的“高势能”与东盟市场的“大潜力、弱供给”之间存在巨大的“发展势差”, 而广西作为中国唯一与东盟国家陆海相邻的自治区正是弥合这一势差、实现价值创造的关键链接点。其核心矛盾在于, 如何利用其不可复制的区位优势(S1)和国家战略机遇(O1), 系统性地弥补其致命的产业与创新短板(W1、W2), 从而在异常激烈的外部竞争(T1)中, 避免被“边缘化”(T2)的命运。这一研判清晰地指明, 广西的破局之路不能仅停留于简单的招商引资, 而必须是一场以提升内生能力为核心的深刻战略变革。

3 广西战略定位的量化评估

为了将前述宏观环境与 SWOT 分析进行系统性整合, 并为战略选择提供一个更为客观、量化的决策依据, 本研究使用 IFE 和 EFE 矩阵分析工具。通过对影响广西承接大湾区新质生产力外溢的关键内外因素进行加权评分, 旨在标定广西当前的战略坐标, 揭示其战略制定的优先方向。

3.1 评估方法与评分标准

为实现客观量化评估, 本研究采用内外因素评价矩阵, 将前述定性分析转化为可度量的指标, 以精准研判广西承接大湾区新质生产力的战略态势。该方法的核心标准如下:

权重(Weight)的赋值基于各因素对核心目标影响的深度、广度与紧迫性, 以衡量其相对重要性, 高权重(0.1~0.2)分配给具有全局性、决定性影响的因素(如国家战略支持、创新生态缺失); 中等权重(0.05~0.10)分配给特定领域有重要影响的因素; 低权重(<0.05)分配给影响范围较窄的因素。所有内部或外部因素的权重之和等于 1.0。评级(Rating)采用 1~4 分制, 评估广西应对各因素的当前表现与效能。内部因素(IFE)评级标准为: 主要劣势(1分)至主要优势(4分); 外部因素(EFE)评级标准为: 响应不力(1分)至响应出色(4分)。加权分数(Weighted Score)由“权重×评级”得出, 该分数综合了因素重要性与应对表现, 其总分以 2.5 分为中线, 用于判断总体战略态势的优劣, 并能有效识别关键的战略优势与痛点。

3.2 内部因素评价矩阵: 核心能力与根本短板的量化剖析

IFE 矩阵旨在评估广西在面对承接新质生产力这一特定任务时, 其内部优势与劣势的相对强度。IFE 矩阵通过为各关键内部因素确定权重并逐项评分, 得出一个综合加权分数, 以判断其内部战略地位的强弱。

IFE 矩阵分析结论: 广西的 IFE 总加权分数为 2.13, 显著低于平均水平(2.50)(见表 3)。这

—结果量化地揭示了广西在承接新质生产力外溢方面，其内部战略地位是薄弱的。尽管拥有评级为4的顶级地缘战略优势（S1），但其在创新生态（W2，权重最高达0.20）、产业基础（W1）和人才储备（W3）等决定新质生产力“吸收能力”

的核心维度上，均处于评级为1的“主要劣势”状态。这些根本性短板的负面影响，远超过了其优势所带来的正面效应。这表明，成功的战略必须将弥补这些核心内部劣势作为首要任务，而非仅仅依赖其区位优势。

表3 内部因素评价矩阵

项目	关键内部因素	权重	评级(1~4)	加权分数	评价依据与注释
内部优势	S1. 独特的战略区位：中国唯一与东盟国家陆海相邻的自治区	0.15	4	0.60	评级4（主要优势）：该优势是广西核心、不可替代的竞争力，在国家战略中地位突出，为构建“枢纽经济”提供了根本前提。
	S2. 丰富的战略性矿产与生态资源	0.12	3	0.36	评级3（次要优势）：锰、稀土等资源为承接新能源电池材料产业提供了坚实基础；生态资源对接大湾区康养需求潜力巨大，但转化效率仍待提升。
	S3. 与大湾区已建立的坚实合作基础	0.08	3	0.24	评级3（次要优势）：已有顶层规划和一批合作园区，2023年大湾区投资额巨大，表明合作渠道通畅，但合作层次和能级有待提升。
	S4. 跨境贸易与物流的增長势头	0.10	3	0.30	评级3（次要优势）：西部陆海新通道货运量持续增长，与东盟贸易额屡创新高，显示出强大的通道功能，但向高附加值物流服务转型不足
内部劣势	W1. 传统产业主导（占比近80%），附加值低	0.15	1	0.15	评级1（主要劣势）：产业结构严重失衡，新质生产力的内生性产业基础极其薄弱，与大湾区高科技产业存在“代差”。
	W2. 创新生态系统性缺失，R&D投入强度极低（0.83%）	0.20	1	0.20	评级1（主要劣势）：这是承接以创新为核心的新质生产力的“致命伤”，研发投入、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均远低于全国及竞争对手水平。
	W3. 严重的人才“虹吸效应”，高端人才匮乏	0.12	1	0.12	评级1（主要劣势）：应届毕业生近40%外流，严重削弱了消化吸收先进技术的“吸收能力”，是发展的根本性制约。
	W4. “新基建”滞后与营商环境差距	0.08	2	0.16	评级2（次要劣势）：尽管传统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但算力、工业互联网等新基础设施建设不足；营商环境虽有改善但与大湾区标准相比仍有较大差距
总计		1.00		2.13	

3.3 外部因素评价矩阵：机遇把握与威胁应对的量化审视

EFE矩阵旨在对广西应对外部环境的能力进行系统性研判，通过量化分析，衡量其在利用机遇与规避威胁方面的综合效能。与IFE矩阵类似，它通过加权评分量化广西对外部环境的战略响应能力。

广西的EFE总加权分数为2.48，略低于平均水平（2.50），如表4所示。结果表明，广西对外

部环境的总体响应能力处于中等偏下水平。尽管广西在把握国家战略机遇（O1）方面表现出色（评级为4），但在应对国内外激烈竞争（T1，T2）和核心要素“虹吸”（T3）等重大威胁时，其现有策略显得力不从心（评级多为1或2）。这说明广西目前“扬长”的能力尚可，但“避短”和“抗压”的能力不足。机遇虽好，但广西转化机遇为发展优势的能力，受到外部竞争激烈与自身响应策略不足的制约。

表 4 外部因素评价矩阵

项目	关键外部因素	权重	评级 (1~4)	加权分数	评价依据与注释
外部 机遇	O1. 多重国家战略的交汇 叠加与赋能	0.20	4	0.80	评级 4 (响应出色): 广西已出台全面对接规划, 积极利用“三大定位”、西部陆海新通道等战略争取政策和项目, 响应及时且有力。
	O2. 大湾区产业梯度转移 与资本外溢	0.15	3	0.45	评级 3 (响应较好): 成功吸引了大量投资 (2023 年到位资金 3 730 亿元), 但承接的产业层次仍有待提高, 对新质生产力的精准承接不足。
	O3. RCEP 生效与东盟市 场持续增长	0.15	3	0.45	评级 3 (响应较好): 对东盟贸易额增长强劲, 但多为通道贸易, 利用 RCEP 规则构建跨境产业链的能力尚在起步阶段。
	O4. 全球产业链区域化、 本土化重构趋势	0.05	2	0.10	评级 2 (响应一般): 意识到了作为连接国内与东盟“门户”的机遇, 但在主动嵌入和重塑区域产业链方面的具体行动和成效尚不明显
外部 威胁	T1. 国内周边省份 (湖南、 江西等) 的白热化竞争	0.15	2	0.30	评级 2 (响应一般): 面对湖南、江西等省份系统的对接方案和更优的产业基础, 广西的应对策略缺乏差异化和比较优势, 处于被动竞争状态。
	T2. 来自越南等东盟国家 的成本竞争与产业分流	0.10	1	0.10	评级 1 (响应不力): 在吸引劳动密集型和出口导向型产业方面, 广西的成本优势弱于越南, 且未能有效构建与越南的差异化竞合关系, 面临产业“过境”风险。
	T3. 大湾区对人才、资本 等核心要素的“虹吸效应”	0.12	1	0.12	评级 1 (响应不力): 人才外流问题持续恶化, 尚未出台能从根本上扭转局面的有效对策, 对“虹吸效应”的应对处于守势 ^[1] 。
	T4. “低端锁定”与区域 分工“边缘化”风险	0.08	2	0.16	评级 2 (响应一般): 尽管有意识地推动产业升级, 但在招商引资压力下, 仍存在承接落后产能的风险, 避免“低端锁定”的机制和门槛尚不健全 ^[1]
总计		1.00		2.48	

3.4 战略态势综合研判: IFE-EFE 矩阵的战略启示

将 IFE 和 EFE 矩阵的得分 (IFE=2.13, EFE=2.48) 置于九宫格矩阵中, 可以更直观地确定广西的战略象限和优先任务。

如图 2 所示, 广西的战略坐标明确落于第五象限维持与改进 (hold and maintain) 中, 亦可界定为“选择性成长与内部重塑”区, 该区特征体现为内部能力偏弱 (IFE 分数较低) 而外部环境总体尚可, 机遇与威胁并存 (EFE 分数中等)。基于此量化定位, 广西应确立以“扭转型”为核心的选择性发展战略, 避免采取全面扩张路径; 依托外部高权重机遇, 尤其是国家战略赋能 (O1) 与粤港澳大湾区产业转移 (O2), 系统弥补内部关键劣势, 包括创新生态缺失 (W2)、产业结构薄弱 (W1) 及人才外流 (W3)。该矩阵评估亦从量化层面佐证

了“非对称”发展战略的合理性, 提示广西应摒弃泛化投入模式, 转而聚焦能够发挥其独特资源优势 (S2) 的重点领域 (如新能源电池材料), 通过借助国家政策与大湾区资源实现单点突破, 以推动产业结构与创新能力的局部跃升。IFE-EFE 矩阵将广西的战略态势从定性描述提升至定量评估, 清晰地表明其必须走一条“扬长补短、重点突破”的发展道路。

4 战略跃迁的路径启示与政策建议

4.1 研究结论

本研究围绕广西承接粤港澳大湾区新质生产力外溢以实现跨越式发展, 通过构建系统的理论框架和运用 PEST、SWOT 分析模型及量化矩阵分析工具进行综合研判, 清晰地揭示了广西所面临的核

IFE分数 / EFE分数	弱 (1.0)	中 (2.5)	强 (4.0)
强 (4.0)	I.增长与构建	II.增长与构建	III.收获或剥离
中 (2.5)	IV.增长与构建	V.维持与改进 (2.13, 2.48)	VI.收获或剥离
弱 (1.0)	VII.维持与改进	VIII.收获或剥离	IX.收获或剥离

图2 IFE-EFE 战略定位矩阵

心矛盾与战略抉择。广西若实现发展突破，其战略选择需超越传统的招商引资，转向以提升内生能力为核心的深度结构性改革。其总体思路在于推动广西从一个被动承接要素过境的“通道经济”体，转变为一个能够主动整合、转化并辐射区域价值链的“枢纽经济”体。核心结论如下：

第一，广西在承接大湾区新质生产力外溢的进程中，其战略态势是“独特优势与严重短板并存，巨大机遇与严峻挑战交织”。其重要的区位优势和国家战略的叠加赋能是其最大的战略资本，而产业结构性失衡、创新生态系统性缺失及激烈复杂的外部竞争是其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

第二，广西的战略破局点在于实现从被动、单一的“通道经济”向主动、多功能的“枢纽经济”的根本性转变。这一跃迁的核心，在于构建一个“存量变革、增量崛起、未来布局”三位一体的新质生产力发展战略体系，从而系统性地培育内生发展动能。

第三，实现这一战略跃迁需要一个系统性的路径框架。本研究提出三大核心路径，并以深化改革、优化环境为保障，共同构成了一个从产业重塑、创新培育，到平台深化和制度保障的完整战略体系，旨在推动广西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历史性跨越。

4.2 策略建议

基于上述结论，本研究为广西及其他处于类似

发展阶段的区域提供以下政策启示：

一是战略定位上，必须超越“承接”，追求“共建”与“内生”。政策制定者应摒弃将自身仅仅定位为产业承接地的传统思维，而应以“战略合作伙伴”和“价值共创者”的姿态，主动参与核心区的产业链设计、组织和运营。政策的最终目标应是从“借力发展”走向“内生发展”。

二是产业发展上，必须坚持“三位一体”，统筹推进。为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将“存量变革、增量崛起、未来布局”作为具体实践路径加以落实，具体路径建议如下。

路径一：“存量变革”——以数字化与绿色化对接双循环，打造面向东盟的智慧供应链基地。该路径旨在直面广西占比近八成的传统产业（W1）这一“基本盘”，通过注入新质生产力要素进行彻底改造，实现存量资产的价值重估。此变革依赖于“数字化”与“绿色化”双轮驱动。一方面，应推行“产业大脑+未来工厂”的数字化转型，联合大湾区工业互联网平台，为糖、铝和机械等支柱产业打造数据驱动的“产业大脑”，并推动龙头企业对标“灯塔工厂”进行全流程改造。此举是实现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协同集聚的关键催化剂，Liu等^[21]的研究表明，这种“两业融合”正是催生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机制。另一方面，有研究表明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22]，因此应依托广西的生态优势（S2）实

施“绿色化、循环化”强链工程。通过主动对接大湾区先进环保技术,在糖业等领域构建甘蔗全产业链深度加工与循环经济模式,并在有色金属产业基地引入固废处理与提炼技术,将“环境负债”转变为“绿色资产”。通过这种“数字化+绿色化”的双重升级,广西的“存量”将不再是包袱,而是转变为一个对大湾区极具吸引力的、兼具成本优势和绿色标准,并且能够直通东盟的智慧供应链基地。

路径二:“增量崛起”——聚焦“GBA研发+广西制造+东盟市场”模式,打造垂直整合的跨境产业链。该路径旨在抓住大湾区产业升级机遇(O2),采取“非对称”竞争策略,精准承接能与广西独特优势(S1,S2)相结合的新兴产业,将有限资源精准投放到能最大化发挥“东盟牌”优势的领域,以实现增量崛起。该模式的核心并非GBA与广西之间简单的“研发—生产”梯度转移,而是广西利用其独特的产业基础和面向东盟的经验,扮演“价值翻译器”与“应用再工程”的关键角色。广西将GBA“100分”的顶尖技术,进行“本地化”和“成本化”的二次开发,适配为东盟市场急需的“70分、高性价比”的成熟产品与解决方案。这一角色已在实践中得到体现,例如,广西正推动组建“中国—东盟新能源汽车检测认证联盟”以打通印尼等市场^[23];通过中国—东盟信息港为老挝等国“量身定制”电子发票等数字规则系统^[14]等。这正是广西将新质生产力进行本地化适配的范例。这一定位,使广西超越了湖南、江西等竞争对手(T1)单纯依赖“成本洼地”的发展逻辑,成为GBA落实国家战略、辐射技术标准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战略枢纽”与“适配平台”。核心突破口是聚焦新能源产业链,将丰富的战略性矿产资源(S2)与大湾区强大的技术、品牌进行垂直整合,构建“从矿产采选到整车出口”的、专供东盟市场的全产业链生态。Mao等^[24]认为通过这种方式深度嵌入大湾区供应链,不仅能够获得资本溢出,也可以利用市场信号和信息共享,获得宝贵的“供应链溢出效应”。同时,为服务于这条新兴的跨境产业链,必须依托中国—东盟信息港大力发展数字经济。Liu等^[25]研究表明,“数字经济”与“知识产权赋能”是提升区域新质生产力的“双引擎”,其能够确保广西在承接增量时,从高起点出发,而非仅仅停留在低附加值的代工环节。

路径三:“未来布局”——构建服务于“出海战略”的离岸创新体系。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广西需采取“借脑发展”模式。该路径旨在通过前瞻性布局未来产业(如AI、机器人和量子技术等),培育长远竞争优势。鉴于本地创新生态薄弱(W2),广西必须采取“借脑发展”模式,如在深圳、广州等创新高地设立“八桂科创离岸中心”。该中心作为嵌入全球创新网络的前哨站,专注于跟踪和孵化早期前沿项目。Becker等^[26]的研究证实,公共资助的研发能产生显著创新溢出效应,而“离岸创新中心”正是最大化吸收此效应的有效组织形式。同时,应实施“场景换产业”的精准引育模式,重点开放如智慧口岸物流、跨境农业溯源等广西独特的面向东盟的“跨境应用场景”。此举能吸引大湾区的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高科技研发团队前来测试迭代,Chin等^[27]的研究表明,人工智能是企业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动态能力”,而广西则为他们提供了在GBA本土无法获得的、针对未来新兴市场的宝贵“试验场”,从而实现“以未来市场换未来产业”。

三是制度改革上,必须聚焦“环境”,为市场主体提供充分的“确定性”。上述路径的成功实施,离不开深刻的制度改革和优质的营商环境。新质生产力企业对营商环境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高度敏感。政府应将工作重心从“碎片化”的补贴优惠,转向系统性的制度供给。具体而言,应实施“利益捆绑”战略,通过建立可量化的跨区域利益共享机制深化一体化合作;发起一场“对标世界银行标准、接轨大湾区实践”的营商环境革命;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所有市场主体提供最宝贵的“确定性”。

本研究为广西承接新质生产力外溢提供了战略性、框架性的路径分析。未来的研究可在以下方面进一步深化:一是可运用计量经济模型,对大湾区向广西外溢的具体成效进行量化评估;二是可进行多案例比较研究,将广西的承接模式与湖南、江西等其他承接省份进行对比;三是可聚焦于具体的合作园区或重大项目,进行微观层面的案例剖析。■

参考文献:

- [1] 王廷惠,李娜.新质生产力催生机制与发展路径:“技术-要素-产业”分析框架[J].广东社会科学,2024(4):

- 14-25, 284.
- [2] 李亚玲, 饶静. “人才 - 科技 - 产业”三链协同下中国新质生产力发展路径研究: 基于动态 QCA 方法的实证检验 [J]. 工业技术经济, 2025, 44(5): 33-42.
- [3] 任宇新, 贺正楚. “科技 - 产业 - 金融”融合互动与新质生产力发展路径 [J]. 财经理论与实践, 2025, 46(3): 67-74.
- [4] 邹国良, 刘娜娜. 科技创新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空间效应: 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例 [J]. 统计与决策, 2022, 38(21): 122-126.
- [5] 霍祎黎, 宋玉祥. 粤港澳大湾区协调发展测度及其经济增长效应研究 [J]. 当代经济研究, 2023(2): 93-100.
- [6] 傅东平. 广西北部湾经济区与粤港澳大湾区的对接融合研究 [J]. 广西社会科学, 2018(9): 44-48.
- [7] 翟云, 潘云龙, 程主. 新质生产力: 生成逻辑、学理意涵与发展路径 [J].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24(4): 33-42.
- [8] 张玉梅, 吴先明. 新兴经济体技术国际化与发达经济体技术外溢研究: 国际专利数据分析 [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23, 40(21): 23-33.
- [9] VENTURINI F. Intelligent technologies and productivity spillovers: evidence from 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J/OL].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2022, 194: 220-243[2025-09-30]. <https://doi.org/10.1016/j.jebo.2021.12.018>. DOI:10.1016/j.jebo.2021.12.018.
- [10] 彭继增, 王幼娟, 李爽. 赣州对接融入粤港澳大湾区的可行性研究: 基于承接产业转移的视角 [J]. 金融与经济, 2020(5): 89-96.
- [11] 罗琼, 钟坚, 王锋波. 粤港澳大湾区高技术产业集聚空间效应与门槛效应研究 [J]. 经济体制改革, 2023(5): 68-77.
- [12] 张玉梅, 吴先明, 高厚宾. 资源“集聚”与“辐射”视角下国际创新中心的成长机制研究: 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例 [J]. 中国工业经济, 2022(11): 97-115.
- [13] 杨豫萍, 张卫华.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背景下粤桂产业动态集聚与转移 [J]. 学术论坛, 2019, 42(3): 81-88.
- [14] 中国新闻网. 广西如何与中国 - 东盟自贸区 3.0 版携手共舞? [EB/OL]. [2025-10-29]. <https://www.chinanews.com/cj/2025/10-28/10505976.shtml>
- [15] 国家知识产权局.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报告显示: 中国拥有的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数量稳居全球第一, 深圳 - 香港 - 广州集群跃居全球之首 [EB/OL]. [2025-09-30]. https://www.cnipa.gov.cn/art/2025/9/2/art_53_201738.html.
- [16] 郑佳, 姚佳彤, 熊书玲. 粤港澳大湾区内部科研合作网络演化研究 [J]. 全球科技经济瞭望, 2021, 36(7): 61-71.
- [17]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 中国 - 东盟自贸区 3.0 版为区域开放合作注入更强劲动能 [EB/OL]. [2025-10-30]. 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510/content_7046181.htm.
- [18]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网. 解读《广西深入贯彻落实“三大定位”新使命第二阶段行动计划(2021-2025年)》新闻发布会召开 [EB/OL]. [2025-09-30]. <http://www.gxzf.gov.cn/zt/xwfb/xwfbh0927/dt/t10286853.shtml>.
- [19] 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 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 [EB/OL]. [2025-9-30]. <http://jyt.gxzf.gov.cn/zfxxgk/fdzdgnr/qtndbg/jyjlbq/>.
- [20]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 2024 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 [EB/OL]. [2025-10-02]. https://www.gov.cn/lianbo/bumen/202509/content_7042859.htm.
- [21] LIU Y, HE Z. Synergistic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J/OL].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 Finance, 2024, 94: 103373[2025-09-30]. <https://doi.org/10.1016/j.iref.2024.103373>.
- [22] LIU H, LI X. How digital technology can improv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Perspective of total factor agricultural carbon productivity[J/OL]. 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2025, 98: 101921[2025-09-30]. <https://doi.org/10.1016/j.asieco.2025.101921>.
- [23] 中国消费者网. 中国东盟新能源汽车检测认证联盟在广西南宁成立 [EB/OL]. [2025-10-29]. <https://www.ccn.com.cn/Content/2023/05-17/1517215575.html>.
- [24] MAO Q, GUO C. Industrial robots, supply chain spillover effect and firm employment: Evidence from China[J/OL].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2025, 229: 106858[2025-09-30]. <https://doi.org/10.1016/j.jebo.2024.106858>.
- [25] LIU Y L, LIN Y C. Converting knowledge into Productivity: the rol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empowerment and digital economy in enhancing regional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forces-evidence from China[J].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 finance, 2025, 102: 104316.
- [26] BECKER B, ROPER S, VANINO E. Assessing

innovation spillovers from publicly funded R&D and innovation support: Evidence from the UK[J/OL]. *Technovation*, 2023, 128: 102860[2025-09-30]. <https://doi.org/10.1016/j.technovation.2023.102860>. DOI:10.1016/j.technovation.2023.102860.

[27] CHIN T, LI Z, HUANG L, et al. How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romote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of firms: a dynamic capability view[J/OL].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2025, 216: 124128[2025-09-30]. <https://doi.org/10.1016/j.techfore.2025.124128>.

ASEAN-Oriented Strategic Leapfrog: Research on Pathways for Guangxi to Undertake the Spillover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from the GBA

HUANG Mingquan¹, LI Xiaoyan², WU Yan², WU Mei³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Trade, Guangxi Vocational Normal University, Nanning 530007;

2. Guangxi Institute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formation, Nanning 530022;

3. Guangxi Arts University, Nanning 530022)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reshaping the regional economic landscape, this study takes Guangxi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examines the internal mechanism and realization path through which it achieves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a corridor economy to a hub economy in undertaking the spillover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from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incorporating spillover effects and industrial gradient transfer is constructed. The PEST and SWOT models, together with the IFE (Internal Factor Evaluation Matrix) and EFE (External Factor Evaluation Matrix), are employed to conduct a systematic assessment of Guangxi’s internal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Guangxi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coexistence of geographical advantages and endogenous constraints, as well as the intertwining of national strategic opportunities and regional competitive pressure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passive undertaking model should be transcended and that a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integrating stock transformation, incremental growth, and forward-looking planning—should be established to achieve structural optimization through the upgrading of traditional industries, the targeted undertaking of emerging industries, and the proactive layout of future industries. Deepening institutional reform and optimizing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constitute the fundamental safeguards for strategic implementation. The study provides a systematic pathway for peripheral regions to leverage spillover effects, cultivate endogenous momentum, and realiz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Keywords: ASEAN;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spillover effects; industrial gradient transfer; hub economy